

汉唐长安昆明池的功用及其文化与文学影响

王作良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疏凿于西汉鼎盛时期的昆明池, 是汉武帝为了训练水军, 以打通西南通道、迎战当时的滇国和南越而修凿的。在汉唐盛世, 昆明池一直承担着训练水兵、供给都城用水即航运的实际功用, 同时也是皇室贵族、文人墨客游赏的胜地,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蕴含着相当丰厚的文化内涵, 并成为词人骚客缅怀盛世、感慨古今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 汉唐; 长安; 昆明池; 汉武帝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3-0018-06

古长安境内的昆明池, 疏凿于西汉鼎盛的汉武帝时期, 是汉武帝为打通通往西南的通道, 为了迎战当时的滇国(位于今云南一带)和南越(位于今广东一带), 训练水军而修凿的。在汉唐盛世, 昆明池一直承担着训练水兵、供给都城用水、渔业养殖的实际功用, 也是皇室贵族、文人墨客游赏的胜地, 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文化与文学内涵, 成为词人骚客缅怀盛世、感慨古今的重要载体。

一、昆明池的功用

昆明池, 又称昆池, 其通往白鹿原的一部分亦被称为神池(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卷四“池沼·武帝初穿池得黑土”条注释二有记:“薛综注引《三秦记》曰:‘昆明池中有神池, 通白鹿原。’凿昆明池时, 汉武帝出于崇古思想, 把昆明池的那一部分叫神池, 又叫灵沼, 是可能的。”^[1], 为上林苑中最大的池沼。上古时已蓄水城池, 称为灵沼, 相传尧帝治水时曾停船于此, 其遗址位于距今西安市西南 15 km 的长安

区斗门镇沔西一带, 是汉代上林苑的一部分, 在西周灵沼的基础上挖凿和扩大而成, 这可从张衡《西京赋》中“昆明灵沼”和《三秦记》中有“昆明灵沼”的文字记载得到证实。

昆明池的得名与云南第一大湖滇池有关, 开凿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打通通往身毒国(今印度一带)的西南通道。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狩元年, 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 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 使问所从来, 曰‘从东南身毒国, 可数千里, 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 慕中国, 患匈奴隔其道, 诚通蜀, 身毒国道便近, 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 使间出西夷西, 指求身毒国。至滇, 滇王尝羌乃留, 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 皆闭昆明, 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 各自以为一州主, 不知汉广大。使者还, 因盛言滇大国, 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2]此前, 汉政府已经通过武力基本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元朔二年(前 127), 卫青率军大败匈奴, 取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为朔方郡。元狩二年(前

收稿日期: 2010-06-11

基金项目: 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王作良(1969-), 男, 陕西户县人, 讲师, 文学博士。

121),霍去病任骠骑将军又两次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汉政府通往西域的道路。故而在元狩三年至六年,为了解决都城的蓄水和教习水军,汉武帝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遣发谪吏在西周灵沼的基础上,重加疏凿,引漓水、交水灌注其中,泮、漓二水又堰入池中,使湖面大为增加。以“越嵩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因名曰昆明池”^[3],这是昆明池的第一次修凿。尔后,汉武帝又征发民力修凿昆明池,时间当在元鼎元年(前116)冬至二年春之间,而且这次大修同样出于军事目的,只是水战的拟定对象有了改变,由原来的西南夷变成了南越。《史记·平准书》记载:“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2]后来,汉政府曾经与南越发生过水战,“其明年,南越反,……(天子)因南方楼船卒……击南越。”^[2]由此可见,昆明池操练水军的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昆明池的水战操练功能,在唐初依然有所发挥,唐王朝建都长安后,昆明池的功用又一次得到利用。唐贞观元年(627),唐高祖李渊临幸昆明池,以观水军练习。《旧唐书·高祖本纪》中记载:“(武德)九年三月庚寅,幸昆明池,习水战。”由此看来,当时的昆明池还发挥着操练水军的功用,不知什么原因,此后就不再有操练水军的记载。

除了训练水军的功能外,昆明池在西汉时是都城长安供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长安城规模宏大,人口众多,比同时代西方最大的古罗马城还大3倍,因此城市供水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西汉统治者在修建长安城的时候,就考虑到充分利用周围的自然河流,用纵横交错的渠道和人工开掘的池塘,把周边河流连结为一个完整而有机的供水系统,使泮河、漓河、渭河、漓河等相互连通,保证了长安城正常的水源供应。昆明池的水源来自交河(交河开凿于西汉时期,是配合昆明池的开凿而开挖的人工河道,起着拦截漓、漓主流的功用,使它们改道向西流入泮河,截断昆明池上流的水源,一方面降低了京城地表水的高度,减小了水患对京城的危害,另一方面在截流处建造的一些堰坝等水利设施,又保证了昆明池保持着较为充足的水源),每当水位过高时,它可把多余的水排到泮河。《水经注》中记载:“交水又西南流与丰水支津合,其北又有汉故渠

出焉,又西至石碣(按:即石阙堰)分为二水:一水西流注丰水,一水自石碣经细流诸原流入昆明池。”其供水渠道分为3支,第一支流向长安城南面和东面,同漕渠相接,通向灞桥,供应城南地区的用水,并起着调节漕渠水量大小的作用;第二支由长安城的西南角流入沧池,未央宫和长乐宫的用水依靠沧池,而太液池则供应建章宫的用水;第三支则经过长安城北,入太液池。宋代著名地理学家程大昌首先注意到昆明池和都城用水有关,他在《雍录》卷6“昆明池”中写道:“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为都城之用,于是并城疏别三派,城内外皆赖之。”^[4]清顾炎武在《肇域志》“陕西”卷3对昆明池供水的3支作了详细的论述:“汉漕渠,武帝元狩三年所穿。上接秦渠(按:即所谓的秦漆渠),下入昆明池。分三派去,其一派自昆明池东为明渠,东过长安城南,又过城东合王渠北流;其二派自昆明,北为飞渠入城。飞渠者,以木槽接水上流,逾隍入城,渠若飞而过也。既入城,则引而东至渐台为沧池。又东过未央北明光南,有东过秦(按:‘秦’应作‘汉’)长乐宫出都门,外合王渠、明渠水入渭。其三派自昆明北经长安城北,过秦阿房宫东,入揭水陂,又北入唐仲池,又北过城西门建章东,又西过建章北,入太液池,又北入渭。”在长安城所有的供水系统中,昆明池不仅容量极大,其水质清澈也是极其有名的。隋诗人虞世基在《长安秋》中曾咏道:“寒露台前晓露清,昆明池水秋色明。”^[5]可见,至隋代,昆明池水还是很洁净的,其供水作用也就显得至为重要,发挥着总蓄水库的功能。

因为有充足的水源,汉武帝以后的一段时间,昆明池兼具养殖之利。据《西京杂记》卷1记载:“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6]直到唐代仍是如此,《刘宾客嘉话录》有记载:“昆明池者,汉孝武所制,捕鱼之利,京师赖之。”^[7]昆明池开始养鱼的时间,依清人张澍《二酉堂丛书》辑《三辅故事》的说法,在汉武帝的继承者汉昭帝在位时期,其中云:“武帝作昆明池,以习水战,后昭帝小,不能复征讨,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余付长安市,鱼乃贱。”有关“昭帝小,不能复征讨”云云的谬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中有辨析,可参看。

在汉唐两代的很长时期内,昆明池还具备航运之利。西汉时,从石阙堰入昆明池的故渠中段在秦

时已经存在，为秦代漆渠的一段。昆明池南沿渠（今长安区石匣口、普贤寺等村）百姓称之为“漆渠河”，当时修筑的目的是运输从子午古道挑来的山货，之所以叫漆渠，相传与秦修建阿房宫有关。唐代李泰等著《括地志》中说：“漆渠，胡亥筑阿房宫工开此渠，而运南山之漆。”《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秦倡侏儒优旃因二世即位后，“欲漆其城”，旃讽刺说：“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旃所说的抑或有夸大的地方，但秦修建与装饰宫殿所需的数量庞大的材料，大都来自于都城附近的终南山，漆渠的开挖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昆明池开挖后，漆渠还发挥着运输的作用。自清代至今咸阳秦都区境内管辖的南乡在郭里还有叫漆渠的村庄，可见其影响。

《史记·河渠志》记载：“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渭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三令月而罢。……通，以漕，大便利。”^[1]漕渠开挖于汉文帝时，在昆明池开凿之前，附近就已经有了漉池和漕池。漉池，《诗经·小雅·白华》即咏叹道：“漉池，侵彼稻田。”《三辅黄图》中记载：“（漕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汉武帝修建昆明池后，连通了漉池和漕池。其中的一支从池东开口引水，东流横绝灞河，注入通向黄河的漕渠，为漕渠上源。昆明渠遗址在今西安市郊区还隐约可辨。据《西安市汉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介绍，昆明池东岸发现 2 条进水渠遗址：一条位于万村以西约 220 m 处，南北宽约 160 m，最宽处达 420 m，在万村东南方向，水渠又分为 2 支；另一条位于第一条进水渠水口北约 570 m 处，宽约 25 m，依据其走向，应为第一条的分支。除了 2 条进水渠，还有 4 条出水渠：第一条出水渠位于堰下张村东北角东侧的西岸上，南北宽约 100 m，最宽处约 300 m；第二条出水渠位于落水村南的昆明池北岸西部，破坏严重，遗迹宽约 5 m（据考古人员对土层堆积情况大都分析，此水口似乎一直在使用，直到晚唐因昆明池的淤塞而废弃）；第三条出水渠位于南沔村西南约 80 m 处的昆明池北岸中部，现存出水口宽约 8 m，深约 3.5 m，底部及两边用卵石铺砌而成，水渠宽 20~50 m，流经南沔村后，与下文所述的第四条出水渠汇合；第四条水渠开口于大白店村西约 270 m 处的昆明池北岸

东部，水渠宽约 40 m，亦用卵石铺砌而成。值得一提的是，水渠底部堆积着大量贝壳、8 枚不同种类的铜钱、砖瓦碎块、碎石块等，似乎昭示着昆明池昔日航运繁盛的景象。

漕渠的开挖，是为了保证京城粮食、燃料、铁器和其他物资的顺利运送。其后昆明池的开凿，使长安城的航运从八水、临潼、渭南、二华夹漕，经潼关县的三河口直接与黄河相连，极大地便利了长安城附近物资的运输与贸易。对此，史念海先生在《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代城的影响》中有过精当的评述：“渭水下游多弯曲，可以另辟航道。前面曾经提到汉长安城外的漕渠，就是以之代替渭水下游的航道的，漕渠引用的水就有来自昆明池中的水。汉长安城西南的昆明池，汇集沔水和交、沱二水，助长漕渠的水势。漕渠由这里过汉长安城，漕渠由这里过汉长安城南东流，通到黄河。”今咸阳附近为渭河中游的分界，下游水量比较平缓，河道宽阔，因昆明池的调节，加上灞、泾、沔等大河的流入，水量大增，为航运提供了天然的便捷。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昆明池干涸后，其航运功能遂告终止。从昆明池引出的水进入长安城周围的漕渠、王渠，而且流进城内的明渠作为排水沟也是有效的。中唐后，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人口的激增以及森林的过度砍伐，水上航运常受泥沙淤阻困。

二、历代文人对昆明池的吟咏及其文化与文学影响

昆明池堤岸上柳树成荫，廊房环绕，每至夏季，荷香阵阵，景色如画，池中鱼虾肥美鲜嫩，无异于江南水乡，可以称得上北国大地的人间仙境。再加上丰厚的文化内涵，昆明池引得汉唐以来历代文人吟咏不绝，《初学记》以及宋初李昉主编的《文苑英华》即收有多篇以昆明池为歌咏对象的作品。

汉武帝以后，从汉安帝延光三年（125）至唐大历二年（768），历代皇帝多次驾临昆明池。至于文人墨客于此送亲访友，游池观景，抒发怀抱，更是不胜枚举。再加上后人为昆明池的修建及其景观附会了很多神秘的色彩，昆明池就成为文人怡情悦性和抒发古今感慨的胜迹。北朝诗人庾信就作有《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文苑英华》卷 164 题作《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小船行钓鲤，新盘徒摘荷”^[8]

就是当时昆明池的真实写照。另外,庾信还作有《和灵法师游昆明池诗》。

由陈入隋的虞世基、江总和由北周入隋的薛道衡、元行恭都有以昆明池为题材的作品。入隋后,江总与元、薛交好,其《秋日游昆明池》云:“灵沼望萧条,游人意绪多。终南云影落,渭北雨声过。蝉噪金堤柳,鹭饮石鲸波。珠来照似日,织处写成河。此时临水叹,非复采莲歌。”^[9]依诗意,此诗当为江总入隋后至南归前(589~593)作。诗末“此时临水叹,非复《采莲》歌”,颇受后人称道。《采莲》是梁武帝《江南弄》七曲之一。在异乡人江总的眼中,昆明池美则美矣,却听不到南国之曲,暮年思乡情油然而生,这也是他请求南归的缘由。元行恭《秋游昆明池诗》中“阵低云色新,行高雁影深。欹荷泻圆露,卧柳横清阴”^[9]几句,写出了深秋时节昆明池清丽、衰飒的情景。

唐代,昆明池经过几次的浚修,更是湖光绿树连天,洲渚莲叶环绕,水色碧蓝鉴人,楼船小舟相映,成为帝王将相游宴娱乐、文人雅士泛舟题咏和黎民百姓观赏的长安城南风景区。现存吟咏昆明池的诗作有:宋之问、沈佺期、李义山3人的《昆明池侍宴应制》诗及杜甫《秋兴八首》(其七)、白居易《昆明春》、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坊——访吕逸人不遇》、温庭筠《昆明池水战词》、贾岛《昆明池泛舟》、苏颋《昆明池宴坐答王兵部王旬三韵见示》、无名氏及朱庆余《省试晦日与同志昆明池泛舟》、范灯《忆长安》、李百药《和许侍郎游昆明池》、胡曾《咏史诗·昆明池》、储光羲《和东观群贤七夕临泛昆明池》、童翰卿《昆明池织女石》、白居易《昆明春》、韩偓《乱后春日经野塘》等。从中可知,昆明池作为长安城南游乐饮宴胜地,给人们带来水乡的乐趣,由此也透视出昆明池的沧海桑田变化史,亦可看作是昆明池盛衰的史实记录。有唐一代,由于科举考试中以诗赋取士,所以还出现了以咏叹昆明池为主题的赋作,如宋之问《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李子卿《昆明池石鲸赋》、王起《汉武帝游昆明池见鱼衔珠赋》、王起《昆明池习水战赋》、张仲素《涨昆明池赋》、宋悛《涨昆明池赋》等。

盛唐之前,当朝皇帝多次驾幸昆明池饮宴作乐。为了助兴,当时的文人学士多有应制作品,今保留在《全唐诗》中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宋之问的《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最为有名,当时同题作品颇

多,而且皇帝主持了一次赛诗会,亦可谓别开生面。《唐诗纪事》卷3记其盛况云:“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预章才,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10]沈、宋之间的诗赛,实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一段风流佳话,也为昆明池涂上了浓厚的文化色彩。昆明池系汉武帝征南操练水师所凿,宋诗由此生想,一笔写两面,赋中宗晦日游池的同时,通篇用汉武帝故事以切合奉和颂圣之体制。详全诗寄意,其醒明“文治”以为婉讽之意为其主旨。宋诗能于诸作中脱颖而出,可谓名副其实。虽为应制之作,但委婉得体,历代诗评家对此都有好评。历代唐诗选本中,有关咏叹昆明池诸作,该诗的入选次数仅次于杜甫《秋兴八首》。

说到昆明池的吟咏,不能不提到杜甫的《秋兴八首》。《秋兴八首》是大历元年(766)杜甫五十五岁旅居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时的作品,诗以组诗的面目出现,八首蝉联,歌咏了盛唐帝都长安有代表性的风光胜迹,体现了诗人深沉的忧国之情。咏叹昆明池的为第七首,其诗曰:“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诗人置身于长江三峡的崇山峻岭之中,思绪遥接千载之上,情感又郁结于对大唐帝国衰落的忧患,既写了昆明池辉煌的过去,展示唐朝当年国力昌盛、景物壮丽和物产丰富的盛景;又描绘了“今日”昆明池凄凉衰败的秋景,堪称历代吟咏昆明池的压卷之作。其中“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备受后人称道。其妙处在于咏史与写实的完美结合,表面上是咏汉武帝,但也是对唐玄宗统治时期昆明池上声势浩大的水军操练的深情追忆。清人仇兆鳌曾说:“若远谈汉事,岂可云‘在眼中’乎?公《寄贾严二阁老》诗:‘无复云台仗,虚修水战船。’则知明皇(玄宗)曾置船于此矣。”^[11]仇评可谓深得老杜之良苦用心。另外,织女、石鲸、菰米、莲房等景观,被赋予了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作者因世乱而引发的漂泊之情也不言而自明了。在吟咏昆明池的诗篇中,诗圣杜甫的作品可谓独步千秋。

至中晚唐,昆明池已接近干涸,但游人仍不减泛

舟池上的兴致。贾岛《昆明池泛舟》诗云：“一枝青竹榜，泛泛绿萍里。不见钓鱼人，渐见秋塘水。”“不见钓鱼人，渐见秋塘水”反映了当时昆明池水的实际状况。尽管如此，昆明池内仍旧荷花似锦，鱼翔水底，鸭眠沙草，风光宜人。无怪乎中唐诗人韩愈在《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中云：“问言何处芙蓉多，撑舟昆明渡云锦。”^[12]就是在干涸以后，昆明池的流风余韵还依然迷人。

昆明池的修凿和疏浚，对于帝都的政治安定与经济繁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汉唐历史上的大事。所以后世的人们抱着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看待昆明池的修建以及相关景观，也使昆明池蒙上了几许神秘的色彩，积淀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诗词（赋）创作的文学意象。

昆明池是在西周灵池的基础上挖凿和扩建的，此前是一片面积很大的沼泽或洼地，抑或是西周丰镐二京的一部分。开凿时，曾经有过炭末的发现。对此，西晋人干宝《搜神记》中有过记载：“汉武帝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试问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外国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灰墨问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乃知朔言有旨。”^[13]（该条记载还见于干宝稍后的东晋人曹毗《志怪》中，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7“地部下昆明池四”引。《志怪》一书现已不存，惟一的佚文就是上述记载，保存于盛唐时成书的《初学记》一书中，见该书第14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另外，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竺法兰传》、《佛门正统》等，《三辅黄图》中亦有记载（因该书成书时代跨度大，且有古本与唐代定本的区别，故而该条记载的写定时代难以确定），各家记载，文字略有出入。在《竺法兰传》中，“外国道人”变成了竺法兰。

《志怪》中昆明池的有关记载，表明了当时佛教“劫”的观念已传到中国。汉明帝时期，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不久，“劫”的观念也慢慢被人们接受。“劫”的观念认为，世界经历若干年毁灭一次，毁而复生，佛经里将一个周期称为“一劫”。“一劫”又包括成、住、坏、空4劫，到“坏劫”时即有水、火、风三灾出现，使世界归于毁灭。“劫火”指的就是“坏劫”时的火。东方朔以“应声辄对”而闻名，颇得武帝宠幸。

东方朔为人虽很诙谐，然颇能察言观色，对于好大喜功的武帝不失时机地直言切谏，曾谏阻武帝滥建上林苑。这则故事隐约流露出告诫的意思，因记载过于隐晦，告诫内容难于确知。《北史》“列传第七十儒林下”载：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是岁发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则土木之功，动人兴役，天辄应之以异。”^[14]汉武帝晚年，灾异不断，《北史》中的议论即有感而发，《志怪》的记载也许亦源于此。近人王国维《咏史》（其九）亦有类似议论：“汉凿昆池始见煤，当年费力信雄哉！于今莫笑胡僧妄，本是洪荒劫后灰。”^[15]

后来，文人在作品中常常用到这个典故，常见的表述有“池灰”、“灰劫”、“劫尘”、“劫灰”、“劫烧之灰”、“烧灰”、“昆明灰”、“昆明劫灰”、“黑土成灰”、“昆明劫”、“劫火烧”、“劫墨”、“劫尽”、“沉灰”等。如清代诗人黄景仁《太白墓》中云：“长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16]黄景仁用“昆明劫灰”表示了对诗人李白的无限敬仰和痛惜之情。而晚唐韩偓的《乱后春日途经野塘》：“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原注：一作“有”）劫灰。”^[17]诗题标明“乱后”，诗人的盛衰之感难以抑制，“昆明劫灰”正代表了对于战争的憎恨和对世事难料的无限感慨。在晚唐李商隐《寄恼韩同年二首，时韩住萧洞》中，“劫灰”则代表着美好事物与美好时光的消逝，原诗云：“帘外辛夷定已开，开时莫放艳阳回。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18]“莫放艳阳归”，指新婚夫妻要尽情享受爱情的甜蜜。而“韩同年”当时暂居萧洞，眼看“辛夷花开”，艳阳春天就要逝去，若不及时行乐，“便是胡僧话劫灰”，到时候，眼前的一切欢乐都要消逝了。

昆明池的养殖功用，衍生出鱼儿报答汉武帝的故事，这在西晋潘岳《关中记》中已经出现了记载。这条记载，今本《关中记》不载，徐坚《初学记》卷7“昆明池第四”中曾加以引用，得以流传，原文如下：“昔有人钓于昆明池，鱼绝纶而去。遂通梦于汉武帝去求钩。帝明日戏于池，见大鱼衔索，取而放之。间三日，池边得明珠一双，帝曰：‘岂非鱼之报耶？’”^[19]鱼衔珠的寓意，概在于赞美帝王的好生之德和臣子希求得到重用的心情。沈佺期《昆明池侍宴应制》中有：“灵鱼含宝跃，仙女废机迎。”^[20]应制作品往往难脱阿谀之嫌，沈佺期的这首诗也不例外，上引两句说的是一代女皇武后受到欢迎的情况。中

唐时期的王起, 还曾作过以鱼衔珠作为歌咏对象的大赋, 题为《汉武帝游昆明池见鱼衔珠赋》(以汉武帝游昆明池为韵), 也是以鱼喻人, 充满了对帝王的感恩戴德之情, 其中云: “以言于鱼也, 厥道斯存。以言于人也, 如何勿敦。然则受嘉惠, 蒙渥恩, 得不效节于当代, 而重名于后昆。”^[21]

石鲸, 还有分列于昆明池两岸的牛郎、织女石刻, 也被后人赋予了丰厚的文化意蕴, 特别是牛女石刻, 后世演变为影响中国民俗一千多年的七夕文化,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慢慢游离于昆明池的文化影响之外, 成为独立的文化因子。限于篇幅, 兹不赘。

三、结 语

昆明池是西汉鼎盛时期为训练水军而开凿的, 其后还具备为京城提供水源、航运、养殖等功能。除此之外, 因其优美的风景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在汉唐盛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昆明池还是京郊的游览胜地, 留下了文人墨客大量的吟咏文字, 他们以一种异常崇敬的心情缅怀昆明池昔日的繁华, 使得昆明池蒙上了几许神秘而迷人的意蕴, 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清代中叶乾隆时期, 汇聚众多天然湖泊而形成的昆明湖, 其得名即取自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操演水战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 钱仲联. 清诗纪事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 [4] 程大昌, 黄永年. 雍录: 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5]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6] 葛 洪. 西京杂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韦 绚. 刘宾客嘉话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8] 倪 璠. 庾子山集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9] 计有功. 唐诗纪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0] 李嘉言. 长江集新校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1] 仇兆鳌. 杜诗详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12] 韩 愈. 韩愈全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13] 干 宝. 搜神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4] 李延寿. 北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5] 吴组缙.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1.
- [16] 黄景仁. 两当轩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6
- [17] 韩 偓. 韩翰林集 [M].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 [18] 刘学锴, 余恕诚. 李商隐诗歌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9] 徐 坚. 初学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0] 陶 敏. 易淑琼. 沈佺期集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21] 董 诰. 全唐文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Function of Kumm ingchi Lak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Han-Tang's Chang'an

WANG Zuo-liang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train the shuijun (waterborne troops) to fight against the army from Dianguo and Nanyue, the Kumm ingchi Lake excavated in high period of Emperor Hanwudi was always playing the practical role in training the shuijun, supplying the water for the urban daily life and shipping. Meanwhile, it was also a famous scenery spot for the noblemen and the writers. To the present time, it has quite abundant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s also taken as the influential place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 Han-Tang, Chang'an, Kumm ingchi Lake, Emperor Hanwudi